

世·界·印·象·丛·书



季红真/主 编

Chendanyan

◆ 陈丹燕 著

像鸟儿

那样飞过



在旧市政厅 教堂 喷泉和鸽子
组成的广场上
一定有人在弹着吉他唱歌
那是一些流浪的年轻人
唱着他家乡的歌谣 温柔 感伤
怀着对这地方疏离的爱

◆ 沈阳出版社



世·界·印·象·丛·书



季红真/主 编

Chendanyan



◆ 陈丹燕 著

像鸟儿

那样飞过

在旧市政厅 教堂 喷泉和鸽子
组成的广场上
一定有人在弹着吉他唱歌
那是一些流浪的年轻人
唱着他家乡的歌谣 温柔 感伤
怀着对这地方疏离的爱

◆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鸟儿那样飞过/陈丹燕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 12
(世界印象丛书)

ISBN 7-5441-1784-7

I. 像…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381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35 千字 印张: 7.25 插页: 2
印数: 1—51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程欣欣 潘晓翊
封面设计: 杨 群

责任校对: 朱科志
版式设计: 欣 欣

定价: 14.00 元



走出国门的惊喜

——序《世界印象》丛书

季红真

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断变幻着的概念，它以各种方式强化着国人的记忆。

首先是武力的方式。与欧亚大陆比邻相接且西高东低的地势，使中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为国防的大患。于是有了历朝历代连续不断的修长城的壮举。近代航海业的发达，则使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武装登陆的门户。随着政治版图的忽大忽小，民族心理处于波动之中。周边弱小民族的纳贡称臣，成为种族记忆中“中央之国”的精神强迫症。而频繁的外侮，则使民族心理的创痛，时时发作为精神上的歇斯底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的记录为数不少，所谓中华民族其实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种族来说，纯粹的汉人早就被排斥到了边远的山地中。这就使盲





目的自大与自卑交替轮回，民族的心理处于深刻的分裂状态。

其次则是以学术思想的方式。有学者考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百家争鸣，是外来民族的思想影响结果。魏晋时期佛学自印度传入，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潮，并且汇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明代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数学，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而近代西方从民主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东渐，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并且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这要算是最大的一次冲击与影响。

除此之外，广义的文化传播更是自古不绝。从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到各种各样的器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都源源不断地流传进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更是彻底地改变着国人的世界观。时下的高科技，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极大地影响着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更是以温和的方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从中古西域的琵琶羌笛，到近代的交响乐与电影，已经是中外杂糅华夷难辨。中国的文化不由自主地融入旋转的世界格局中。

世界强迫着中国人认识它，而中国人也自古有着了解世界的冲动。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孔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世界所接受，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先知。而关于新儒学复兴的倡导，更是当代华人试图为危机中的人类提供精神家园的努力。其中文化上的自负，则是古已有之的民族心理的延续。

11/3/17/05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被动的形势下打开国门的。这就使晚清出洋的一代学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对于坐火车之类的新鲜经验，对于域外民族鲜明的国家意识的强烈震动，对于各种艺术样式引起的兴奋，以及作为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都使他们在艳羡中饱含着自卑，或者以一种更加狂傲的姿态表现出刻骨的轻蔑，辜鸿铭当是一个最极端的代表。

20 世纪中叶的东西方冷战，使国人对世界充满了神秘的恐惧。国门关得越来越紧，外面的世界在宣传中变得凶险。“世界革命的中心”则是古之“中央之国”的精神强迫症的当代版，而对世界的好奇又以一种极端反叛的姿态，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心理内涵。直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成为既定国策之后，洞开的国门使来来往往的人流带来了崭新的信息，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怕了。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又使民族的自信心日益提高。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努力在各个方面与世界接轨。加入 WTO，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由此带来的文化碰撞是剧烈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21 世纪人类最大的矛盾是文化的冲突。不独中国，迄今为止的人类，实际上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之中，因而有了“后殖民理论”，它是由一个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亚洲人提出来的。这就使思想者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悖论，他们在对抗西方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在西方的思想中寻找话语资源。实际上，“后殖民文化”早就开始了，伴随着早期武力征服的殖民运动，相关的文化影响与商贸



活动已经改变着人类文化的构成。革命导致的资本逃亡，也以经济的方式使文化传播。走在莫斯科的一些小街上，可以发现哈尔滨等白俄殖民城市的景观。印度的孟买与上海的外滩颇多相似，而长春的一些街区与日本的小城镇也难分彼此，而保留的语言中的信息，就更加丰富。近代以来的外来语，是所有国家语言中都难以排斥的成分。

高科技的发展，无疑刷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特别是信息科学的普及，缩短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世界变得越来越狭小与拥挤，形象的说法是地球村。在数码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相似，比如分裂，比如恐怖，比如生物武器，比如艾滋病等等。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如何确立民族精神的主体，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课题。

文学是民族精神最敏感的神经，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兴起的“寻根文学”，即是中国新锐作家们对全球化浪潮的急速反应。而大批出访作家的散文随笔，则是以感性的方式，记录了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由最初的眩晕到平和坦然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一份宝贵的心理资料，记录了被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人深刻的精神蜕变。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希望能够和读者一起重温这个过程，并且使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人，也能分享对未知世界的兴趣。尽管影视等传播媒介等已经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一份间接的经验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财富。本套丛书所辑作品的写家，大都属于最早走出国门的人们。细致的艺术观



察力，则使他们比自己的同类更多了一份情感的体验，这构成了他们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充分个性化的视角与丰富的细节，又为读者提供了多层次的观赏内容。和世纪初的域外游记相比，世纪末的文人更多了一份面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平静与从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古老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精神逐步成熟的标志。虽然文化的落差依然存在，当中国人在呼唤现代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在反省现代文明的弊病。我们毕竟可以冷静地接受世界的真相，避免狂妄的自欺与盲目的自卑。

是为序。

2001年12月于北京



像鸟儿那样飞过(自序)

到欧洲去看看，看我们小时候在小说里、图片上和电影中见到过的、向往的欧洲，不是去当学生，不是去那里住一辈子，就是去看看，去找找，这是我的理想。我猜想，也是我同时代许多青年人的理想。那些在 70 年代度过青春期的青年，偷偷地传着翻烂了的欧洲小说的青年，偷偷地用简谱学唱《外国民歌 200 首》里面的“小夜曲”的青年，用风雷牌收音机偷偷收听澳大利亚之声华语广播的青年（因为那家电台的播音员说话的声音温和有礼），常常在清晨跟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密纹唱片，学英文 900 句的青年，那些青年，都是我的同志。但是在三十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理想会成为现实。我们都以为我们永远与欧洲隔绝了。

然而，世界终于变化，高墙终于倒下，我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个理想。

没有那个理想，没有这个时代，没有从过去到现在的



经历，就不会有我的文章，我的书，我的成长。这是一定的。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私人护照旅行以后写下来的。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之久。这十年里，我渐渐习惯了旅行，我经历了梦想被现实打破的痛苦历程，知道了我用纸片创造出来的欧洲，是一个活在中国人心里的欧洲。当我站在欧洲的大地上，心里一直将我指引到欧洲的那个理想，就像夏天的巧克力那样融化坍塌下来了。我的文章里，记录了这个过程。所以我要说，这是一本和个人成长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书。书中很长的句子，是因为心智在成熟的过程中，分辨总是困难，表达总是游移，需要用牵丝攀藤的句子。一个人不只是在肉体上成长，还有精神上的成长。一个人精神上的成长，并不是和肉体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庆幸自己能够在旅行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2001年12月



目 录

走出国门的惊喜 季红真 001

——序《世界印象》丛书

像鸟儿那样飞过(自序) 006

等待出航 001

慕尼黑流水账 016

梦中之乡 040

穿长裤的女人 050

通往波罗尼亚的道路 072

金发情意结 083

东德人波德 095

芭芭拉·王 106

目 录

中国人的微笑	120
孤独的人	132
在永无国长大	149
C—P: 中波海运公司	166
犹太人	181
科拉克夫方场上的月亮	197
编后	216



等待出航

“现在大约是可以了。”我在很黑的夜里醒来，好像一直在等着这个时刻。

那是个万物都安静下来的时刻，那天并不冷，就像上海初春一般的情形，我能想象得到，在楼下的，被砍了梧桐树的窄街上，现在一定飘浮着蓝灰色的城市夜气。然后我想起今天的日子，就是去年起程去德国的日子。去年的此刻，早已半睡半醒，心中不宁地翻动许多杂乱的心事，或者说是梦境，童年时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看到的旧咖啡杯，在欧洲电影里看到的金发环绕的微笑，安徒生童话的插图，密纹唱片里的莫扎特，1988年美国的小丹的照片，非常好听的轻柔流利的英文，纷纷涌到面前，我躺在枕上一时不能分辨回忆与梦境的区别。心情有一点喜悦有一点伤情。当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被搅动时，我的心情常这样。现在的此刻，我躺在同一个枕上，分辨着黑暗中没移动过的家具，闻着被污染的都市稠重的空气，从在洋铁





皮旧货店荡来荡去看外国人留下的旧八音盒时开始，我就习惯了这样的空气。

看上去什么都没变，可想起来却有一点淡淡的惊异，在雪堡厨房里独自喝茶时的看雪，在慕尼黑郊外的森林里透过泪水仰望从未见过的蓝天，柏林墙博物馆，红色的厨房，木头的摇椅，响亮的亲吻，那是在欧洲啊；夏天听着《孤独的傻瓜》流泪，坐在桌前好几天，写不出一个字来，那是在回家之后啊。从去年到今年，那些地方和故事，那些人，让我的灵魂飞得那么远，但它们又把我的身体带回原处。我惊异，原来有的人的巨变竟然是在还原的不动声色之中。

检查自己的心情，那不可回头的悲伤好像不再沸腾，它像离我家不远的华亭路上的欧式旧屋一样，在这深夜里在多年不变的黄色灯下静伏不动。我的眼睛透过我家的墙壁，透过常熟路上被冬雨浸得发黑的梧桐树粗大的树干和轻轻浮动的夜气，看到世纪初由欧洲人建造，1949年又被他们放弃的旧屋，在荒芜的花园后面，月光使它们有了一些优美的阴影，仿佛时光再来。我心里有一点缓慢的波动就像音乐。“好了，现在大约是可以了。”我想我是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再小心翼翼绕开德国旅行，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可以开始清点我的收藏。

我的确是一个非常向往欧洲的中国孩子，就像怀念家乡的外乡人。

1992年冬天的中午，我撕开雪堡图书馆的来信，读到第一句“很荣幸地通知你”。记得我在一辆灰色的领导



坐车边尖叫起来，司机探头出来看我，但我却不能控制地对他继续欢呼，就像一只小鸟从破了的鸟笼里拼命挤出来，跌跌撞撞扑向天空所发出的激烈的声音。一年之前的我，还天真地认为从此会一飞冲天，终于回到遥远的欧洲。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我把左手插在大衣里，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欧洲，访问学者，春天，那真是梦想成真的美妙时刻。到今天我仍这样想，而且再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像这样令我心花怒放的机会。

在那件被卡琳后来称为高品位的中式黑大衣里，我用手轻拍自己的肩，在回家的路上走，一半是祝贺一半是告慰。到那时为止，我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住了三十三年，我结婚八年没换丈夫，毕业就在杂志社工作，十年没换过写字台，六年前在抽屉里写的“真坏”，是因为当时的社长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开抽屉就能看见我对他的评价。在那桌边，我成为作家。我幻想有全新的生活，那天好像就要得到了。其实，事实证明那只是我的天真，一种我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天真。

这个定义我是在五月的柏林的柏林墙博物馆里获得的。当时，我坐在健康的美国孩子中间，看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我坐在那里看东德的人们笑着哭着向西边飞奔。一个女人，穿着鲜蓝色的，充满社会主义气息的茄克，像鸟似的掠过摄影机。她脸上的茫然与紧张，我熟悉那是不能置信的狂喜，就像我那天紧握着邀请信在街上走。在剧场的黑暗中，我的眼泪哗哗地冲下来，我真想问那个女





人，现在她心里是否失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心里的确有种纯朴的浪漫，脸上也就会有天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比我们更像成年人，独立、冷静、有序。只是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欢天喜地地在常熟路上走，怀着生活从头开始的妄想。

后来，我住进医院动了胆囊手术，胆里的结石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发作，是在走路穿高跟鞋时，病况并不典型也不严重，吃一粒止痛片就缓解。为能全力并长期对付新生活，在元旦的第二天，我动了手术。

我的对面床上，住着一个做乳房整形的女人，房间里还有个癌症病人、一个乳腺病人。

晚上我曾听到房间另一半两个病人的谈话。那是个深夜，医院的热水汀丝丝地发出轻响，窗外寒风大作，病房的脚灯照亮磨石地上的花纹。癌症病人是个年轻丧母的姑娘，割去了两个乳房。她们很不理解做乳房整形的病友。癌症病人说：“49床(我的病床号)是要出国，没有办法，我看她心里也不想开刀。”

乳腺病人说：“49床一定要开的。外国的医药费吃不消。我家邻居去日本前，特地去把阑尾割掉，一点点蛀牙拔掉，外国没有什么公费医疗。”

手术中我很神经质，被加了麻药，我睡着了。我的家人、要好的同事和朋友都等我出来并带来了白色的水仙花，可我没看见。他们后来告诉我，从开刀间出来，我没有表情面色青白。他们说，这样的人怎么远走千山万水，要么连医院一起搬，像从前的一个电影，叫《鬼魂西



行》。我的丈夫说，为了出国把一个人折腾成这样，真是作死。但我有半个世纪共产党党龄的父亲说，这是社会主义给我最后的优越性。

开刀的最初三天大风大雪，父亲每天上午肩背湿透地来看我。我心痛父亲，担心自己，常对父亲发火。到慕尼黑的第一个星期，缪勒太太领我和葡萄牙的安吉拉一起去帕兴买交通绿卡，一出雪堡大门，看见护城河那端有辆蓝色巴士摇摇晃晃地开来，缪勒太太呼啸一声，率领安吉拉追车而去。我刚跑了一步，气就没了。那时我开刀刚两个月。在莫扎特的萨尔茨堡，我背着行李和苏打水爬到山顶的罗马时代城堡去。在波茨坦，我贪婪地吃冰，身体不再成为问题。在欧洲大陆上，我变得棕黑健康，那时我开刀五个月，我的身体状况好得空前，是我从未想到的收获之一。本说得对，你永不会知道在生活里你会遇到什么。他的对策是：不幻想。我想这就是西方人的为人。我学不来。我有许多的幻想像玻璃杯一样，在欧洲大地上被撞得粉碎，但幻想继续生成，继续像空气中的灰尘跟随着我。只是我此后懂得如何区别现实与幻想，因此也懂得了放手，这是后话。

当时我是摇摇晃晃走进德国领事馆去签证的，我的丈夫嘱咐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坚持站住。”

就这样，我为这次出国，做了所有我能做的。

1992年，中国已有十多年开放的历史，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伴随着告别朋友，他们去澳洲、日本、法国，去巴西、南非、香港。我陪他们买轻便的衣箱，买成打的内

